

李文绚 著

风吹枷锁

中国新闻史著名报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吹枷锁：中国新闻史著名报案/李文绚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9

(报界档案/方汉奇，李彬主编)

ISBN 7-211-03540-4

I. 风… II. 李… III. 新闻工作—文化史—中国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3987 号

风吹枷锁

FENGCHUI JIASUO

——中国新闻史著名报案

李文绚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编：350003)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4.875 印张 6 插页 108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11-03540-4
G·2383 定价：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盛世罹难	(1)
------------	-------

——何遇恩、邵南山“捏造小抄”被斩案

●游园报道，风波顿起	(1)
●皇家恩怨，隐及报人	(4)
●盛世罹难，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7)

风吹枷锁	(11)
------------	------

——惊天动地“苏报”案

●革命思潮孕育时	(12)
●风云际会	(17)
●张园演说言无忌	(20)
●鼓吹革命震人心	(23)
●惊天动地“苏报案”	(26)

西出阳关	(32)
------------	------

——彭翼仲《中华报》、《京话日报》被封案

●无妄之灾	(32)
●袁世凯亲下逮捕令	(36)
●手枪走火之突变	(41)
●西出阳关	(45)
●尾声	(48)

借刀杀人终得计 (49)

——《民报》在日本被封禁始末

● 闻名遐迩的《民报》 (49)

● 清政府的运动 (51)

● 章太炎严辞抗议 (52)

● 同盟会内部的分歧 (54)

● 庭讯 (56)

锒铛其鸣犹不改 (59)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连续被控案

● 蔡乃煌的隐忧 (59)

● 于右任其人 (61)

● 抨击甘督升允 (65)

● 被判逐出租界 (66)

● 由“呼”而“吁”，再接再厉 (68)

● 诉讼又起 (70)

奇文惊世 (72)

——清政府湖北当局在辛亥革命前夜制造的“大江报案”

● 惊世奇文 (72)

● 詹大悲和《大江报》 (74)

● 亡中国者和平，救中国者大乱 (75)

● 黄侃酒酣著奇文 (77)

反思孝道，祸起萧墙 (79)

——《浙江新潮》“非孝”风波

●反思孝道，施存统著《非孝》	(79)
●风声鹤唳，压制接踵而来	(81)
●醉翁之意不在酒	(82)
●针锋相对，众志成城	(84)
●还有后来人	(86)
难将一手掩众目	(88)

——《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杀案

●戴在刘煜生头上的共党红帽子	(88)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91)
●函电交驰，势如雪片	(94)
●国民党内部的谴责	(96)
●记者节的确立	(97)
南京岂是放言地	(99)

——成舍我《民生报》被永远停刊案

●小报大办的《民生报》	(99)
●揭露行政院官员贪污舞弊	(101)
●彭、成讼案又起纷争	(103)
●《蒋电汪于勿走极端》的发表	(105)
●永远停刊，永远不许在南京办报	(106)
“辱邦交”何以服人心	(110)

——《新生》周刊事件

●黑暗中接过邹韬奋的火炬	(110)
--------------------	-------



●闲话皇帝，日本人借机寻衅	(112)
●国民党俯首贴耳，条条照办	(115)
●当局为何如此顺从日本人的旨意?	(117)
●“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	(119)
一心偏左，遇礁难避	(123)
——南京《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案	
●“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新民报》	(123)
●南京《新民报》被永久停刊的导火线——军事泄密案	(127)
●由来已久的冲突	(130)
●报道战争形势——南京《新民报》成了国民党的 “眼中钉”	(134)
●勒令永久停刊	(135)
●瞬间成为舆论的焦点	(138)
参考书目	(142)

正因为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雍正与胤禩一党的权力斗争，何遇恩、邵南山才以区区报道雍正游园事件的消息而身首异处。对比雍正五年发生的程如丝畏罪自杀案，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如果不是因为怀疑该报与胤禩一党的流言排陷有关，这一案可能不会受到如此重的处罚。

盛世罹难

——何遇恩、邵南山“捏造小抄”被斩案

游园报道，风波顿起

让我们的目光穿越历史的重重帷幕，回到 200 多年前的那一天——公元 1726 年的端午节。

那一天与历史上任何一个端午节比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一天发生的许多事情也都宛如尘埃飘逝未留下一点痕迹。但是那一天发生在圆明园的一件小事却值得我们略书一笔，因为这件事引起了后来记载在新闻史上第一个有名可考的报人被杀害的报案。

雍正四年五月初五日的端午节，京师西郊的圆明园。

端午节时，已是初夏。尽管 200 多年前的历史再也不可能复现了，我们仍能看见初夏时节的圆明园，蓝天、白云、碧波荡漾

的湖水，鲜花在开放，树上的新绿葱葱郁郁，叶子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闪烁烁。

1726年，传说中因篡改遗诏才夺得江山的雍正皇帝即位的第四年。这段时间，雍正的心情并不好。当然这也许和前面几年一样，因为康熙朝末年你死我活的储位斗争和扑朔迷离的授受过程，继位的大喜迅速转变成维护皇权的隐忧。这个在储位斗争中风头不健的雍正虽已继位，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合法性而斗争。端午节快到了，当内务府向雍正请示今年是否像以往一样把龙舟修整好，以备端午节游玩时，雍正却制止了。这与雍正以往的做法可不一样。尽管他在位以来不尚奢华铺张，为人也颇严肃，可为了联络群臣感情，每逢佳节，倒是经常宴请诸王大臣，或饮酒赋诗，或泛舟湖上，或赏花钓鱼，可这一年的端午节他却没有安排任何游宴。

端午节前一天，雍正降旨令在城的诸王大臣不必去圆明园叩节。到端午节那天，仅仅召集在圆明园居住的王大臣等十余人到勤政殿侧的四宜堂吃了粽子。

端午节就这么过去了，非常短暂而平淡。端午节过去了几天，一份报房小报登出了这样一则消息：

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圆明园叩节毕，皇上出宫登龙舟，命王大臣等登舟，共数十只，俱作乐，上赐蒲酒，由东海至西海，驾于申时回宫。

这明显是一则失实报道，均属于虚乌有。

雍正看了这则报道大发雷霆。初九日，他发了一道谕旨称报房“捏造小抄，刊刻散播，以无为有，甚有关系”，要求兵部和刑部“详悉审讯，务究根源，以戒将来，以惩邪党”。

又过了几天，发出这一消息的报房负责人何遇恩、邵南山被

判斩刑，于同年秋后处决。

似乎中国所有的封建王朝在钳制舆论、镇压非法出版物时都会批下这么些字。但是，如果你知道在清朝初年小报实际上被默认为的合法状态，就会发现这一谕旨之措辞十分严厉，其处罚也非常严重。

清朝小报的发行人大多是清代官报的发行者——提塘官们。提塘官在发行官报之余自己也采录一些消息，为广大官员提供正式官报所不能提供的更多的信息。由于并非官方报纸，所以历朝历代小报的毛病它们多多少少免不了，或是报道失实，或是泄露了机密，或是发出了不允许发出的大臣递给皇帝的请示报告或皇帝的批示。小报自从在北宋末年开其端绪以来就一直处于封建统治者的围追堵截之中，发行小报的人一开始就被指责为“奸人”、“不逞之徒”，小报则被指责为“造言惑众、乱有传播”，被视为非法出版物，到南宋时期压制则愈甚。而在清朝，小报则是被官方默许存在的合法公开出版物。同样是小报，待遇却截然不同，原因何在呢？

这当然与清朝小报的官方发行人的身份有关，但这并非主要原因，否则为何同样是官方发行人的自留地，同样有不实报道，在清初则为合法，不予追究，而在清朝中期则视为非法，非斩尽杀绝不可呢？

当清朝的建立者作为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以气吞万里之势越过那道长城入主中原之际，他们很快发现，为维系自己对中原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的统治，就不可避免地要吸取汉族的先进文明，而当时汉族经过历朝历代发展完备的封建制度更是值得积极地效仿。康熙就是一个积极追求封建化、加强中央集权的君王。而他之后的雍正、乾隆更是将加强中央集权视为要义，从而使清朝成

了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国家。清军入关以来至康熙末年之前各朝，基本还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阶段，因而对小报的存在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到康熙末年，也曾发布了一些上谕禁止小报的发行，但没有什么效果，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案件。而雍正年间关于报道雍正游园失实的案件便成为清朝在个案上对小报由宽容转向压制的转折点。

但是，对比雍正五年发生的程如丝畏罪自杀案，我们发现，对报道雍正游园活动失实的小报的严厉查禁，除受加强中央集权的大背景影响外，还有其他原因——即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

程如丝作为四川的按察史，因事获罪，雍正下旨马上处斩，而有关的部文却比刊有这一消息的小报晚了五天到达，结果程如丝在部文到达之前就畏罪自杀了。对这一事件，雍正只是指示今后要严加防范以免先期泄露，却没有追查报人。而描绘升平盛世君臣同乐的报人却受到严厉的斥责并被残杀。这是因为当时雍正正与曾争夺皇位的诸皇子集团进行权力斗争，怀疑这则报道出于该集团的流言诽谤。自然，这个小背景与当时的加强皇权的大背景不无关系，或者说，没有这个大背景，也不会形成这个小背景。但这个小背景则是形成这一报案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雍正与其他皇子的恩怨作一次回眸。

皇家恩怨，隐及报人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京城西郊的畅春园。

年届七旬的康熙皇帝如同耗干了的油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尽管他在生前是如此尽力维护自己的皇权，却不得不将他的权力

移交给另一个人。谁是他意中的继承人呢？

晚上戌刻，康熙崩逝，新帝雍正即位。

雍正继位之后，有关其篡位的谣言满城流传。

有人说皇位原本是十四阿哥的，隆科多矫诏将皇位给了四阿哥，有人说雍正亲自将遗诏中的“十”改成了“于”，甚至有人说，康熙是雍正毒死的。

之所以有这些谣言，是因为雍正在康熙朝几十年的夺嫡和储位竞争中并不突出。那么究竟是康熙在最后几年终于选定了雍正，还是雍正篡位以自代呢？

几百年前的事件真相永远不可能搞清楚了，后人争论不休的也只是后人心中想像的一幕。对于何遇恩和邵南山来说，重要的不是雍正以何种手段取得了皇位，而是雍正以何种身份取得了皇位。正因为雍正并非诸王大臣和皇子所属意的身份，雍正一继位就得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斗争，何遇恩、邵南山的命运似乎就在此时决定了。

康熙最先选中的皇位继承人是他的嫡子胤礽，孝敬仁皇后的儿子，这也是康熙惟一的嫡子。

太子慢慢长大了，而康熙对太子却由以前的抚爱变成了猜忌。太子长大以后，他和皇帝就不仅仅是父与子的关系了，他们还是现任皇权拥有者与下任皇权拥有者的关系，而皇上只有一个，矛盾便由此产生了。当然，解决矛盾的主动权在康熙手中。

事情最终的结果是慢慢积累的。在康熙感受到太子威胁他的权力、太子没有仁爱之心、太子行为不端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太子就便被废黜了。

太子被废黜后，其他皇子顿觉天地宽广，各显神通，使康熙迅速感觉到储位空虚所引起的动荡不安。

康熙如坐针毡，马上又将废太子胤礽推出前台。

太子位一恢复，对皇权的隐忧又在康熙心底泛起，再次怀疑太子结党夺权。于是太子很快又被废黜。

太子再次被废后，争夺储位的佼佼者除了八阿哥胤禩外，还有十四阿哥胤禵。而后来的雍正皇帝四阿哥胤禛在此时依然不显山不露水。这并非是他不想当皇帝，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兄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却没有那么咄咄逼人。

此时，在诸阿哥争夺储位的舞台一角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这就是年方12岁的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弘历似乎是在四阿哥胤禛、后来的雍正皇帝有意识的布置下出现在康熙的视野里的。胤禛在奏请皇帝来圆明园观赏牡丹之时，把这个出类拔萃的儿子带到了他祖父面前。圆明园里，这个12岁的孩子的聪慧和非凡，使还差六天就69岁的皇帝极为喜欢。在这之后，他要走了弘历的生辰八字，并像一个真正的老祖父一样向雍亲王打听弘历的各种琐事。仅仅事隔八天，康熙再次驾临圆明园，宣布将弘历带回宫中养育。这对雍亲王来说，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也许，他煞费苦心地将弘历带到康熙面前就是为了这件事，子以父贵，父以子贵，要知道，当时在宫中抚养的皇孙仅仅只有废太子胤礽的次子。

后来无论雍正还是乾隆都将这段历史大肆渲染，言外之意是老皇帝看中了这个皇孙，想让他成为隔代帝王，因而将重心转到了胤禛身上。

应该说弘历对康熙选择继承人发挥了一些作用，康熙有可能将胤禛父子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但是，这只是一种猜测。对于我们叙述的问题来说，这个猜测是否成立也并不十分重要。我们只是为了表明胤禛在争夺储位斗争中所处的位置，并为了介绍他继位后面临的对手。因为不管胤禛是以什么方式得以承续大统的，

他由一个默默无闻的配角一跃成为光彩照人的领衔主演，必然引起他人的不满和不尊，甚至可能由不承认他的身份发展到推翻而取而代之。

由于皇位不稳，雍正在治理国家的同时，竭力打击原本可能成为皇帝的诸皇子，而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他也有必要使对手们永无翻身的可能，而失去了话语权的诸皇子只能以谣言的形式排泄积怨。这样，报人和胤禩集团就有了联系在一起的可能。厄运在一步一步地向何遇恩和邵南山逼进。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办小报的人稍有不慎都有可能成为何遇恩和邵南山。

盛世罹难，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通过康熙时的争储斗争，你可以看出，雍正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头脑的人。在他继位之后，他对胤禩、胤禪、胤禵集团的斗争同样体现了这一点。

按照一般帝王的做法，他继位后应该不遗余力地将对己不满的政敌置于死地而后快。可雍正并没有这样做，他的皇位不稳，这样做无疑火上添薪。因此，他的第一步是稳定局势，特别是以笼络的方式稳定他的兄弟的情绪。因此，他给了他的兄弟们许多相当高的礼遇。可事情走到它的极端之后必然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果然，后来，雍正就不断打击他的兄弟们，甚至令其两个最具威胁的对手把名字改为“阿其那”和“塞思黑”，在满语中，它们是猪和狗的意思。

皇子党在短短的几年就被雍正各个击破，被打得七零八落。皇权的争夺最终以雍正的胜利而告终。

在与胤禩一党进行斗争时，雍正很讲究名正言顺，在斗争最为激烈的雍正四年，我们看见雍正的谕旨里充满了对诸皇子的遣

责，有许多“狂妄悖乱，包藏祸心”等词。尽管我们知道这只是封建统治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策略，尽管诸皇子确实有一些不利于雍正的举动，他对诸皇子添加的罪名还是让我们颇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感。正因为这样，短短几年内迅速的变动使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流言。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关于雍正夺位的说法外，还有“凌逼弟辈”以及一些对雍正个人形象的贬损。而何遇恩和邵南山一案就与这种关于雍正个人形象的流言密切相关。

据雍正自己说，他天生不能饮酒。但颇令他苦恼的是，自他继位以来，却经常听到有关他嗜酒的流言。有的传言说，雍正天天饮酒，有的传言说，雍正经常与隆科多饮酒直至夜深人静，隆科多有时沉醉不醒，就令人抬回家。这种流言不仅在京城时有所闻，即使远在西南四川等地也流传不休。曾经有一个四川的官员到京城叩见皇帝时，就这样奏明“臣在四川，闻人流言皇上日日饮酒，今臣到京已久，朝夕侍从，始知皇上涓滴不饮”。

还有一个外地官员叫路振扬的来京陛见时，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说，“臣闻流言谓皇上即位后常好饮酒，今臣朝暮入对，惟见皇上办事不辍，毫无酒气”。官员们的上奏自然有阿谀的成分，但却说明了不管雍正是否好酒，有关他饮酒作乐的传言却很多。

雍正正处于与胤禩一党斗争的关键时期，于是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样的传言是他们传播的。而以往尽管经常听到此等传言，却没有找到具体的传谣人和具体传谣事件，而此时，报道雍正端午节游园的小报描述的正是这样一幅子虚乌有的饮酒作乐情景。何遇恩、邵南山就这样与胤禩一党联系了起来，撞上了雍正的枪口。

分析雍正在庚子下的关于追查游园报道的喻旨，雍正是这样得出他的结论的：

首先，雍正认为以前胤禩、胤禪、胤禛等人结党之时，就经

常结交僧道喇嘛、医卜星相，乃至优人、贱隶、西洋人以及大臣官员之家奴，当想排击他人时，就捏造无影之言，让这些人传播出去。

其次，胤禩和胤禵素日沉湎于酒，雍正曾训斥过他们，因而使他们怀恨在心，故意捏造流言，使雍正以好酒之名传天下。

而何遇恩、邵南山报道雍正游园又严重失实地说雍正饮酒作乐，长时间进行游宴，所以，办小报之人肯定与胤禩等人是一党，“捏造小抄”，因而要追查，“务究根源”、“以惩邪党”。从这些措辞，我们可以看到，雍正把这件事没有定性在传谣上，而是定性在捏造谣言上，而且认为背后一定有邪党做主使人。

说雍正嗜酒一定是胤禩一党传播的倒有这种可能，因为谣言总是由宫廷传向民间，胤禩之人在成强弩之末时也可能在小节上败坏雍正的形象以泄愤，但是说何遇恩、邵南山是胤禩一党，为其捏造谣言的话，则经不起推敲。因为造成这种失实有几种可能：或者是胤禩等人制造，指使何、邵刊登；或者是胤禩一党制造流言，何、邵听说了，也没有核实就刊登了；或者是参与游宴的官员胡乱夸张，以显皇上的优遇，小报据此而刊登；或者是没有采访打听，按以往的惯例写的。这就像现在一些记者写会议报道一样，事先写好，会场也不去了，等登出来后却发现会议因故议程全变了。雍正不是经常邀请诸王大臣游宴吗？而端午节前，内务府总管也曾请示是否照例修整龙舟的。一般来说，四种可能都有，但根据雍正处治何、邵的谕旨来看，第一、二种特别是第一种的可能很小，因为这篇谕旨中根本没有提到胤禩等党，若真是胤禩等人指使或根据胤禩等人的谣言写的，雍正在谕旨里早已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了。第三种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谕旨的大部分篇幅都是教导群臣千万不能矜夸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而第四种可能

性也存在，因为除了何、邵两人外，并没有追查出其他人。

那么，雍正这样追查这篇报道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决心与胤禩之党作斗争。下令追查之时自不必说，完全是从追查胤禩等人制造谣言为出发点的；即使最后判处何、邵秋后处斩而并没有发现胤禩等人指使时，其目的还在于禁止传播涉及皇帝的谣言。而其谕旨中论及的一些为自己游宴、接受群臣进贡、赏赐群臣开脱的话，也是维护自己的形象，以挽回胤禩之党谣言的不良影响。

正因为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雍正与胤禩一党的权力斗争，何遇恩、邵南山才以区区报道雍正游园事件的消息而身首异处。对比雍正五年发生的程如丝畏罪自杀案，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如果不是因为怀疑该报与胤禩一党的流言有关，这一案可能不会受到如此重的处罚。

为了压制反满、反清思想，清朝素以文字狱著称。但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又与其他时期有所不同：其文字狱的铸成均与政治斗争有关。查嗣庭案、钱名世案均是如此。

与上述案子相比，报道雍正游园失实的案子似乎不为人所注意，除了在中国新闻史书上占据短短的几行，一般的清史书籍找不到关于此事的记载，就连专门谈及雍正时代文字狱的书籍也没有提到它。

但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事件。因为，当何遇恩、邵南山的身影如惊鸿一瞥般在强盛的清朝一掠而过，就拉开了我们这本书的第一幕。自此开始，清朝统治者开始意识到舆论传播的重要性，开始重视查禁小报。到乾隆年间，新闻传播已完全置于清庭控制下，直至清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维新派、革命派报纸冲破言禁，从而敲响了清朝灭亡的钟声。

《苏报》与爱国学社社员约定写稿，在报上鼓吹革命，使《苏报》的发行量直线上升，并有读者的来信这样说：“窃叹上海无报，而不谓贵报乃放出异常光彩，程度上涨进何其速也。”

1903年5月27日，陈范又专门聘请章士钊总揽《苏报》笔政，从而使《苏报》走上了创办以来最光辉灿烂的岁月。

风吹枷锁

——惊天动地“苏报案”

1903年7月15日，上海。

从四马路老巡捕房风驰云卷般冲出一队人马。在前的是几名白人巡捕，几十个印度巡捕跟在后面，他们手中拿着枪械，耀武扬威地骑在马上，中间则有两辆囚车。

这队人马穿过浙江路大桥，到达了租界的会审公廨。

紧接着，在会审公廨里开始了一场罕见的审讯：案件的原告是清政府，案件的被告是清政府欲除之而后快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鼓吹者。

案件的被告有六个，齐刷刷地站着，其中有两个人特别突出。一个年纪很轻，头上的辫子已经剪了，穿着一身西装，脸上显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坚毅。一个穿着一身不中不西的袍子，头发有